

感,但至少他们缺乏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觉,而这些来自对群体仪式的热情参与”^[14]。就此而言,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即在社会治理中使得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

参考文献:

[1][7] 王俊秀. 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24.
[2][3][6] 陈满琪. 群体情绪的测量研究综述. 社会心理研究, 2012(1).
[4][5] 王潇、李文忠、杜建刚. 情绪感染理论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10(8).
[8] 王俊秀. 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5(4).
[9][13] 乔纳斯·特纳、简·斯黛兹, 孙俊才、文军译. 情感社会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17.
[10][14] 兰德尔·柯林斯,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互动仪式链.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159-160.
[11][12] 乔纳森·特纳, 孙俊才、文军译.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9:173、19.

移动互联网和人类情感:命题、视角、结论

□ 刘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普遍的移动互联网接入,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项,进入中国社会大约已经有三到五年的时间。每个用户的移动QQ和微信开通的时间,大概可以作为测量这一时点的首选方案;而他们移动QQ和微信的开通率,大概可以作为国人利用移动互联网水平的一个简易指标。随着从台式机(包括笔记本电脑)时代慢慢转向4G手机时代,一些重要的转型和更替出现了。我们已经见证了电脑端网购消费逐渐被移动端网购消费所取代的趋势,也经历了BBS和开心网、人人网之类在电脑端时代达到顶峰的舆论沟通平台和社群空间的逐渐衰弱。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甚至改变了人类情绪的表达方式。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移动互联网使得原先碎片化的无效时间,变成了充满回报的奖励时间:在一个漫长的、原本以为会引发强烈挫折感的排队队列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安安静静地摆弄自己手中的七寸之屏,脸上露出或兴奋,或莞尔一笑的神情。不管怎么说,讨论移动互联网和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当代社会科学应该加以关注的一个重点论题。



四个理论命题

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围绕“移动互联网和人类情感”这一话题的一些初浅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理论命题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具有方法论上的严格含义,并非实证主义科学传统下逻辑演绎方法最为看重的一个思维工具(其作用类似于假设[hypothesis]或前提[proposition]),更多的毋宁是对自己学术思考的一个片段式总结,类似于英文中的statement这个概念。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我提出如下四个理论命题:

命题1:人类情感的类型大致是固定的,移动互联网很难催生出新型的人类情感,但至少可以使得人类中的某些部分(社会类别、想象的或真实的社区[共同体],或面对面互动的特定小群体)得以找到新的利用和呈现情感的途径、方式和机制。

命题2:移动互联网具有结构—能动性关系的双重向度:一方面,无论从移动互联网的人际配置(表现为移动互联网接入机会的渗透程度,可将人群分为高连接度和低连接度两类)、技术利用深度(表现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用行为的差异扩散程度,亦可将人群分为高利用深度和低利用深度两类)等评价指标来看;还是从移动互联网内的舆论生产和舆论动员本身就具有结构性(也即生产和动员的核心和边缘之分)这一宏观现象而言,移动互联网上的信息生产和消费都是当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模式来看,其本身必然是高度鼓励、容纳,甚至表征个体能动性的一个技术设置。

命题3:拥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个体,他们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三重可能性包括:(1)以个体为中心,使自己成为某个信息生产和发送过程的起点,通过信息扩散的结果(信息接收方接受或拒绝其影响,或由此生成关于信息发送者的某些即时评价)来建构自己的社会地位;(2)个体以某个组织或群体为中心,通过对组织或群体所发送信息的接纳并延伸到行为层次的引导和动员,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成);(3)以上两个社会过程的统一,也即个体作为互动沟通过程中的参与者,处于一个发布讯息和接受评价反馈的均衡过程之中,且前导互动的结果将改变或强化后续的互动特征。

命题4:以上三重可能性实际上对应了我们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经验现象中所观察到的四种人类情感活动:(1)社会地位感的能动建构;(2)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的主动生产;(3)建立在社会比较机制之上的本体论安全感的塑造;(4)建立在社会批评和社会参与基础之上的个体控制感和效能感的形构。前两种人类情感活动对应的是命题3中的前两重可能性,而后两种人类情感活动对应的,则是命题3中的第三重可能性所涉及的两个最为核心的亚过程。

四种经验视角

我想进一步对命题 4 所描述的四个人类情感活动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具体表征,做经验现象上的阐述和例证。我所选择的四个经验现象,分别是:(1) 青年一代的社会文化角色和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亚文化实践和地位建构;(2) 阶级区隔和边缘化与作为适应策略的二、三代农民工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想象的连接”(隐含着意义、价值及本体论安全感的建构);(3) 社交媒体炫富现象背后的社会比较心理及其多重情感效用;(4) 由公共知识分子和愤怒青年的舆论生产和舆论动员行为所表征的个体控制感和效能感建构。

1. 青年一代的社会文化角色和互联网亚文化实践: 社会地位转型和重构的视角

过去 100 年间,中国青年的社会文化角色发生了多次转型:从五四运动时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进步青年,到“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再到 1980 年代建设四化热潮中的四有青年,中国青年一代的主流文化意象,都是一个具有精英社会地位和高度社会意识的社会类别。1990 年代进入到市场化转型之后,在高等教育高速扩张、劳动力市场日益分割化、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以及福利市场化导致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表现为大都市房价高企和教育成本飙升)等多重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共同作用下,青年一代的社会文化意象变得模糊起来。他们有时候成为劳动力市场上饱受诟病的眼高手低一族,有时候成为一毕业就失业的啃老一族,有时候成为大都市里疲于奔命的蚁族和鼠族,有时候则因为在婚姻和亲密关系领域的创新选择而被系上“越轨”的标签。可以说,在多个社会制度(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婚姻、住房)中,青年一代似乎都成了社会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不但他们原先的精英社会地位遭到瓦解,而且他们获得成人资格和追求符合预期的生活方式的努力,也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在这种情形下,移动互联网提供了青年一代重构社会地位的机会。首先,移动互联网利用水平和能力上的代际反哺现象,增强了青年一代的代际地位;其次,移动互联网也是新型职业扩张和创业创新的主要领域,青年一代在该领域的高强度参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亚文化实践(如动漫和电玩、Cosplay、粉丝网站、杀马特文化、表情包等),也整体上提升了他们的文化地位。这一文化地位,既与他们互联网亚文化实践的时尚和前卫特征相联系,又与他们互联网亚文化实践的反抗性和批判性相关联。

2. “想象的连接”和二、三代农民工的本体论安全感
“想象的连接”(imagined connectivity),描述的是个体行动者仅仅依靠在移动互联网上的高度卷入行为,而与

某个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要素,或与自己长久期望加入的参考群体(社群)实现勾连的社会事实。对于一个在现实世界里面遭受结构性排挤,并由此处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边缘的社会群体来说,由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想象的连接”,无疑为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那就是建立在“身份预演”、“意义建构”和“价值输入”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安全感。以二、三代农民工为例,他们大多通过日常消费、基础教育参与以及或长或短的迁移经历,获得了和高度现代性接触的机会;他们进入城市之后,首先在外表和生活方式上接纳了高度现代性的规制,但是他们在各个福利制度中的地位却处于结构性的低位,这就使得他们在城市中极度缺乏安全感。除了常规的向上社会流动努力之外,面对日渐封闭的社会开放性,以及自己无法加以控制的繁忙工作日程,在 4G 手机购置成本和流量成本可控的条件下,转向由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想象的连接”,成为很多处于结构性劣势的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适应策略。它提供了最经济的(节约成本的)社会交往模式,以及最接近身体的(最具有本体论安全感的)、最独立的(最具自主性的)与外界相连接的固定通道。对于一个宿舍劳动体制下的打工妹来说,她们手机中存储的高级婚纱图谱,就是她们对自己无法在现实中获得的生活方式要素的想象预演,该预演为她们当前的日常生活持续输入意义和价值;而对于蜗居于地下室的青年民工来说,移动互联网中的高度卷入,可能成为他隔离恶劣居住环境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并获得心理安全感的一个主要途径。在我的研究方法课程中,学生小组曾经对北京大学保安展开过定性研究,结论之一就是,他们对移动互联网的利用,在日常生活中居于中心性:这一消费活动不仅消减了劳动过程(生产过程)带来的异化感,而且使得他们与主流社会实现了虚拟联结。

3. 社会比较的多重情感效用:从社交媒体炫富现象谈起

社交媒体炫富现象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加以切入。比如说,强调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会说,社交媒体上的炫富行为,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符号消费行为的延伸和继续,符合 Thorstein Veblen 所说的“炫耀性消费”的理论预测。而 David Riesman 早在 1951 年出版的《孤独的大众》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当人们从其他人的社会评价而非自己的内心中,来寻找行为的动机的话,那么任何一种集体行动或时尚追求的背后,都是对外部规范的依归和遵从。换句话说,社交媒体炫富现象,是个体遵循外部规范制约和引导的一个现象表征,这个外部规范既可以是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也可以是以物质财富标定社会文化地位的符号规则。再往前推,对社交媒体炫富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还可以追溯到 Charles Horton Cooley 的“镜中我”概念:在个体通过推算自己在他人眼中的社会形象而建立自我意象的语境中,社交媒

体炫富行为成为个体形象资本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看起来显眼的社会竞争和社会比较行为，实际上成为地位获得和自我形象建构的一个常规实践；与此同时，通过对外部规范的依从和社会评价的重视，个体再次强化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社群归属。所有这些，都导向一个更为根本的人类情感：社会安全感。

4. 公共知识分子和愤怒青年的网络舆论生产和动员：个体效能感的视角

公共知识分子和愤怒青年，是当代中文互联网舆论空间中最为常见的两类社会行动者，前者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话语实践，后者则是迷散在各个阶层的青年人口中的话语代表。公共知识分子试图以理性和独立性作为自己话语实践的特征，而愤怒青年则以批判和正义作为自己话语实践的印记。对于强大的代表正统立场的媒体话语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愤怒青年的舆论实践，实际上表征的是一类非常独特的人类能动性，即在霸权话语体系之下，通过舆论的竞争性生产和交互式动员，达成舆论生产关系的均衡化。尽管每个人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各不相同，尽管互联网的舆论竞争仍然具有结构性，并受到其他结构性强制力的约束和干扰（如资本操纵、五毛、排名造假和流量造假、信息失真和过载等），个体行动者至少获得了信息发布、信息接收和信息反馈的机会，这些机会在移动互联网兴盛之前的话语霸权时代，显然是极具局限性的。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舆论生产和舆论动员的弥散式个体化，对于消减既有话语霸权，塑造个体自主性/控制感和个人效能感而言，是一个支撑性的社会技术。

初步的结论：移动互联网中的人类情感和社会稳定

至此，我对自己心目中关于移动互联网和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的核心观点是，在把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机会分配和个体分化的技术能力看作是结构性力量的一个结果之外，提出多个以个体能动性为中心的命题，也即特定社会行动者将以差别化的方式，对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行动空间和实践可能性进行利用，并以此满足特定的人类情感需要。回到本组笔谈的主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情感治理，本文的立场，并非社会控制的立场；相反，本文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理论指向，即移动互联网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社会地位感的建构，还是社会认同感和社群归属感的形塑，抑或建立在以上多重情感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安全感的生产和维持，其核心的议题是经由事实性的或“虚假的”（套用 George Lukacs 的用法）能动实践，个体的移动互联网利用行为将为他们带来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由确定性所蕴含的安全感。即便看起来似乎会引发失序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愤怒青年的舆论生产与舆论动员实践，也经由 Lewis Coser 所关注的“安全阀效应”的中介，而对社会稳定有潜在的正向效应。

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

□ 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尝试提出情感治理这个概念，是源自对文献和现实的三点反思。

其一，美国著名人类学杂志《民族志》(ethnography) 的一篇论文讨论中国的“送温暖”，认为这样的关怀方式表明中国是一个感性国家 (affective state)，因为西方国家的福利提供是基于公民权利的。^[1] 我的质疑是，难道国家不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吗？其二，我观察到，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常常要面对服务使用者的情感评价，而有效的社会工作服务与正面的情感评价联系在一起，这远远超出我们预设的专业界限，社会工作似乎总要夹杂着情感的劳动。其三，新媒体为个人情绪、群体心理和社会心态的表达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原本被垄断的表达渠道被打开了，情绪的表达自由了，网络社会的具象化与感性化^[2]，无疑对传统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治理体系构成了全新的挑战，需要转变思维更多地考虑和回应民众的情绪与心理。

毫无疑问，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大国转型的关键课题。现在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法治、制度等议题，可能忽视了情感治理这一特殊的面向。很多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讨论是比附西方国家理论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利益与权利。不过，讨论中国的治理体系尤其需要关注情感层面，这有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背景。

在西方的国家理论里，理性压抑情感、利益驯服激情，情感被视为非理性的，它被理性压抑了，交由宗教和社会去处理，国家被理解为理性公民的权力让渡而形成的保护公民的暴力机器。这个治理体系是诉诸权利的、以利益为中心的，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特别是不满与怨恨情绪。但总体而言，情感在治理之中是一个边缘议题。近年来，情感的社会理论开始兴起，这实际上回应了社会学的一个隐含的情感传统，马克思讲异化，韦伯谈理性的牢笼，涂尔干注重集体表征与集体欢腾，托克维尔讨论心灵的惯习。情感社会学、情感政治、情感与社会运动亦成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情感纳入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视野。^[3]

不过，我的立论基础不是社群主义的观点，而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脉络与普通民众的社会想象。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中国人是情本体的，这意味着，情感是立国与